

深一度
浙江新闻名专栏

信息经济邂逅一座城，会怎样裂变？

——宁波信息经济发展调查(上)

本报记者 余晓辰 通讯员 屠炯

编者按

当前，我市信息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。“互联网+”未来空间无限，每一点探索积水成渊，势必深刻影响传统产业，重塑城市格局。

让我们以信息经济之名，走进“互联网+”的风口，探寻这座城市最激动人心的变化。



“互联网+”，就像全新的催化剂，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(胡建华 摄)

传统制造主动+互联网

制造业与大数据、互联网的融合，正在带来一场奇妙的“化学反应”，带领宁波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两化融合”。

在宁波凹凸重工的装配车间，全新下线的产品正在被精密装运，等待渡重洋。“云起重”项目完成开发后，针对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用户，可以实现远程设备维护和诊断。

在宁波凹凸重工的装配车间，全新下线的产品正在被精密装运，等待渡重洋。“云起重”项目完成开发后，针对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用户，可以实现远程设备维护和诊断。

如“凹凸”一般，随着信息化、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推进，宁波的一大批工业企业已经在“两化融合”的转型道路上，给互联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信息实践“标杆”企业称号

根据新出炉的《2014年浙江省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报告》，宁波市产业技术指数达到了1.059，位列全省第一。截至目前，宁波已经与全球最大ERP软件企业德国SAP公司共建“中小企业信息化云服务平台”，成功上线仅半年多就有300余家中小企业入驻运行。

“互联网+”代表着掌控网络的主导权，工业4.0的基因并非欧美企业所独有，只有率先掌控主导权的企业才将长期获取先行者利益。

服务业邂逅信息经济

拿出手机，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个服务号，即可在线完成本地金融产品的购买。这一演变，正是服务业信息化再造的一种折射。

除了同城O2O，跨境电商也成为宁波追逐的风口。近年来，我市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国家试点，已拥有跨境购、世贸通、敦煌网等电商平台以及大宗商品交易所、宁波航空所、第三方支付平台甬易支付上线运营。

引资资本追逐的何止互联网金融领域。在宁波，传统商贸业因为植入“智慧基因”，奇妙的新故事由此发生。“同城O2O”将会是下一个亿万级的市场，今年，我们将把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全面延伸到整个大宁波，并逐步进驻国内二、三线城市。

除了同城O2O，跨境电商也成为宁波追逐的风口。近年来，我市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国家试点，已拥有跨境购、世贸通、敦煌网等电商平台以及大宗商品交易所、宁波航空所、第三方支付平台甬易支付上线运营。

速增长。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的数据，2014年，宁波共实现网络零售额489.7亿元，同比增长82.05%，增幅位居全省第一，高于全省平均增幅34个百分点；市内居民实现网络消费488.32亿元，增长39.90%，实现网络零售顺差1.38亿元。

经济发展规律证明，当工业化步入中后期，服务业将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角。而随着“互联网+”的风起云涌，这一转变也变得更加值得期待。

开启都市“慧生活”

如何提高城市车位利用率？上月底，首批智能咪表亮相甬城街头。“今后，管理员可以

通过手持终端实时掌握车位信息，并同城管和业主等实现连接。”

“今后，同学们不仅可以拿着新一代市民卡享受公交、地铁等城市公共交通出行优惠，同时还能完成学校里的离校考勤，以及轻松实现电子消费。”

“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”，这正是宁波发展信息经济、建设智慧城市的最终落脚点。近年来，我市通过政府投资引导，先后引进了IBM、微软、SAP、中兴、东软、国研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共同参与城市智慧应用的建设。

智慧健康建设不断深入，全市已收集1200万户健康档案信息和9.3亿多条健康档案数据，市公共健康服务平台服务量日均超过8000人次，累计服务人次超过500万，预约挂号、诊疗信息和医疗资源查询等服务的不断推出，大大缩短了百姓的候诊时间。

伴随着全国首家城市“云医院”——宁波云医院的上线运营，一场撬动医药卫生传统格局的“互联网+”改革已然先行。

“宁波通”智慧交通APP集成了出行规划、实时公交、打车、购票、停车诱导、移车服务等便民功能，能让市民一机在手、走遍甬城。

信息经济、智慧城市，美好生活正扑面而来。



制止“正反乱拨”

□黄明朗

智慧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“正反乱拨”，关键在“乱”，形容某些官员主观、随意、任性的行为颇为传神。“乱拨”者或是无能鼠辈，庸碌混世；或是软弱消极，缺乏担当；或是鱼目混珠，表里不一；或是不依不饶，无法无天……表现不同，原因各异；

思想观念致乱。选贤用能，不排除“内举不避亲”，但一经某些人“乱拨”，就变成选官腐败。像江西高官许爱民及妻子、女儿、女婿，皆是泛善可陈之辈，有的甚至严重违法，却均成为政协委员。之所以出现“一门四委员”，在于其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；另一些人则接近已结领导为能事，以期投桃报李，为自己前程打

基础。难怪《人民日报》刊文怒批：也许有人幕后指使，也许有人揣摩上意；前者无良，后者无耻。

违法行政致乱。在城市建设中依法拆迁在所难免，但某些人展现“霸王硬上弓”的决心、气势，视程序和制度为无物，为政绩不惜践踏法律，违背民意，甚至采取“非常规”手段，动辄断水断电断煤气，屡屡发生“黑拆”、“血拆”等惨剧。闹剧表明在一些地方行政部门眼中，行政方式是否合法完全不在他们考量之中，暴露其法治思维的缺失。

人性堕落致乱。公安民警肩负维护社会治安重任，但经某些人“乱拨”，便假象迭出。河南几位民工在太原市一建筑工地讨薪时与保安发生争执，

当地民警本应秉公执法，平息事态，却违反规定，滥施淫威，草菅人命，对讨薪民工辱骂、毒打，农妇周秀云被摧残致死。如此惨无人道，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。

违背规律致乱。发展是硬道理，但某些人违反科学规律“乱拨”，盲目蛮干。去年底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馆建设工地发生底板钢筋倒塌事故，酿成10死4伤的惨祸。原因是该工程被列为该校百年校庆筹备项目之一，为了“面子”“政绩”，相关单位一门心思“赶工期”，导致安全管理不严，工程质量下降，悲剧也就难以避免。

制止“正反乱拨”，还须“拨乱反正”。诚如李克强总理所痛斥的，某些政府办事机构，“该管的事”没有管到

应对药价放开的有效“偏方”

□海纳

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文，决定从6月1日起，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，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（5月6日《新京报》）。

这意味着，今后绝大多数的药价，将由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销售单位自行决定。以前政府限价的时候，药企和药店只能在最高限价以内调整。而现在不同了，他们完全可以放开手脚，愿意怎么卖就怎么卖。同一种药品，可以卖10元一盒，可以卖20元一盒，也可以卖50元一盒。于是很多人开始涨价，要是这些药企和药店任性涨价，消费者怎么办？

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，人们在两件事上最舍得花钱。一是培养孩子，花多少钱都不心疼；二是到医院看病，人家要多少钱，就拿多少钱。培养孩子是心甘情愿，看病买药却是万不得已。人若生病，便浑身难受，思维逻辑和心理防线也往往被打乱。为了尽快消除病患，只能大把钞票往里扔。同一次小病，花一个月的工资，是常有的事。但有些时候患者往往不知就里：很多检查，是没有必要的；很多药品，也是没有作用甚至是有负作用的。

有一种现象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了，以前在政府限价的时候，很多医院和药店的药价，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市与市有差别，县与县有差别，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、同一个县区，差别也是经常见到。一些常用药，有的药店卖10元，有的药店卖12元，有的则卖15元，如果到了医院，就要卖20元至30元。相对来说，小一点和偏僻一点的药店，卖的便宜一些，越大越豪华的药店，卖的价越高。这可能与其经营成本有关，店大一点，房租和人力成本就高，当然得加到药价上。

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后，笔者以为，消费者若想买到对症的实惠药品应对的“偏方”就是，把自己常用的药品列出一个单子，然后多跑几家药店，很快就会发现，哪些药店卖的是高价，哪些药店卖的是低价。人家卖高价，咱管不着，但到哪家店去买药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两只脚决定。你药价时高，态度又蛮横霸道，咱不登你的门就是了。各地的媒体，也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报道。比如选出一些同一品名、同一厂家、同一规格的药品，走访几家几十家药店，看他们各自的零售价是多少，然后公之于众，谁高谁低，立马就家喻户晓。

其实，放开药价，药厂和药店的日子会更不好过。因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大手，也是一只公平的大手。以前一些人很借政府定价的名义，暗箱操作，权钱交易，致使虚高的药价中，包含很多利益输送和腐败成分。现在交给市场来调节，用公开和竞争来平抑药价，会很快把其中的暴利水分挤出去，有利于解决老百姓“看病贵”的问题。

发奖金激励学生提问是教育新风

□殷国安

“同学们，下一个提问谁站起来回答，老师奖励100元。”7日下午，在南京师范大学一堂讲座上，为了打破“有问无答”的“窘境”，“海归”教授张铭当场掏出了皮夹（5月8日《扬子晚报》）。

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，缺乏激烈的观点交锋、活跃的思维碰撞、真诚的情感互动，“有问无答”现象十分普遍。老师抛出问题，学生没有反应或反应冷淡；老师请学生提问，学生沉默不语。专家认为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老师讲深讲透，课堂教学内容乏善可陈，引不起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。这不仅是老师的水平和方法问题，还有政策导向问题。当前，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已是普遍现象，教师评优晋级看的是科研成果而不是教学实效，这直接导致只有少数负责任的老师才会认真备课、用心上好课。

长期以来，中国教育似乎一直存在一种“基因性缺陷”：老师传授学生标准答案，学生接受老师传授的标准答案。这样一来，学生既不需要提出问题，更不可能怀疑老师给出的答案，只能被动地“照单全收”。2012年底，世界卫生组织资深顾问、英国资深心理学专家罗恩博士接受

采访时说：“2006年至今，我来过中国三次，每次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，那就是中国人太乐于寻找标准答案，正确的、神奇的、万能的的标准答案，找不到这个答案就很焦虑。人生的意义在于体验、经历、探索、觉察、感受，世界上哪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？”也正因为如此，在上海纽约大学首届新生入学仪式上，第一任美方校长杰弗里·雷蒙说：“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给你们我们的智慧，不是要给你们我们的知识，也不是要告诉你们某个正确答案。”他主张，不告诉学生现成的标准答案，而是让他们去寻找答案。习惯于接受标准答案的中国学生，要改变这一“基因”，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不仅学生要有改变的动力，整个社会、教育的大环境也要转变。

当然，不能指望张教授的100元奖金就可以改变中国式的灌输教育，但这样做的人多了，转机总是会出现的。张铭说，国外课堂上，教授掏钱奖励学生很平常，“有同学完成了任务，教授直接奖励现金。有的老师发放小礼物吸引同学来上课”。但愿教师发奖金让学生提问的做法，能给当前大学教育带来一缕新风。



懒政惯性催生“活着证明”

□马淙明

有人统计过，中国人一生要办103个证。出生证明、就学证明、工作证明、死亡证明……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位公民被有关部门要求开具一张“证明你妈是你妈”的证明。而在泉州市区的黄阿婆，也遭遇了类似的奇葩事——证明自己还活着（5月9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）。

“活着证明”不是现在才有的，也不是泉州一个地方的奇葩事。因为出现过一些老人去世之后家属冒领养老金的情况，社保部门才想出这么个防范措施。表面看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但避免冒领，未必一定要

这样复杂。既然派出所能够提供证明，那社保部门与公安部门直接沟通一下，或者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，同样可以达到目的，根本用不着群众来回跑腿。政府投入大量财力建设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系统，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效率。如果这种问题也解决不了，这个系统的价值也不大打折扣。

当前，一些公共服务部门习惯“按章办事”，所谓的“章”，大多是延续下来的老规矩。事实证明，很多老规矩早就过时，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。比如“社区介绍信”。很多事情本

来跟社区毫无关系，居委会也无法证明居民很多事情，但在很多部门办事，必须要你拿社区介绍信、证明信。这种怪象，就是由公共服务部门的懒政所致。“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”“一切为了群众方便”，说起来容易，但要变成行动，显然并不那么容易。各种“奇葩证明”的出现，表明一些地方政府、部门做事时，没有真正在替群众着想，服务群众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认为，涉及到各种证明的问题，应该遵循“谁质疑，谁举证”的原则，由行政机关去查证。只有将“谁质疑，谁举证”形成一种制度，使其成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法定义务，群众拒绝各种“奇葩证明”才有了理据，而公共服务部门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，才会想方设法清理而不是设置各种不必要的“证明”。